

读后记

在古雅与俚俗之间

——读郝懿行《证俗文》札记

孙明浩

翻开《证俗文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考据严谨的学术著作，更是一场发生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革命。作者郝懿行，这位“资性迟钝”却毅力非凡的山东栖霞籍学者，用十三载光阴，在正统经学所不屑的“鄙俚之学”中深耕细作，为“俗”的世界构建起一座条理分明、考据精审的知识殿堂。当我们将目光从庙堂雅言移向市井俚语，从经典注疏转向日常器物，会发现郝懿行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条“向下”探索的新路径——在古雅与俚俗之间，寻找文明的完整图景。

一、乾嘉学术的“目光下移”

中国传统学术殿堂中，长期存在着两条泾渭分明的道路：一条是“雅”的坦途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，被奉为正统学术；另一条是“俗”的小径，汇集了民间俚语、生活习俗、日常器物，却长期被视为“鄙俚之学”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这种雅俗之间的等级分野，直到清代乾嘉时期才出现了具有深刻意义的松动。

乾嘉汉学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，以戴震、钱大昕、阮元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，将校勘、训诂、辑佚等考据功夫推向极致，形成了“实事求是、无征不信”的治学范式。他们的研究成果斐然，不仅在经典整理方面贡献卓著，更在文字、音韵、金石、舆地等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。然而，这种学术的高度发展也伴随着明显的局限：学者们的

目光始终固守于“经史至上”的雅学传统，民间俗文化长期被边缘化为经学研究的附庸或工具。

当考据学的方法论臻于成熟，其内在的张力开始显现——精密的方法体系与狭隘的研究视野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。这种方法论的精进与认识论的限制，共同孕育了学术转型的内在动力。学者们在考证经典时，不得不援引方言俗语、名物制度等“俗”的材料作为佐证，形成了“引俗入雅”的研究模式。

在这一背景下，郝懿行的《证俗文》应运而生。他花费整整十三年时间，系统梳理和研究民间俗文化，完成了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。这部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内容，更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。

二、郝懿行的“双重生活”

郝懿行的学术生涯呈现出独特的“双重性”：一方面，他是典型的乾嘉学者，博览群书，精通文字训诂；另一方面，他经常走出书斋，深入民间，向普通百姓学习，记录鲜活的语言和生活实践。这种“在书斋与田野之间”的治学姿态，在当时的学者中极为罕见。

郝懿行创造性地将乾嘉考据学的精密工具运用于俗学研究，形成了“雅俗互证”的独特范式。以“襦襦”一词的考证为例，他首先从《类篇》等古籍中钩稽出该词的原始含义，继而通过实地调查发现，这个词在胶东方言中依然被使用，只是发音发生了一些变化。通过这种古今对照、雅俗互证的方法，

他成功地将一个濒临消亡的古语词重新激活，使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后世学者将郝懿行的研究方法概括为“宗法汉唐、务实求是、征引广博、长于考证”，并认为这形成了独特的“兰皋学派”训诂规范。

《证俗文》的编纂过程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郝懿行在《述首》中自陈“资性迟钝”，但这种自我评价背后，恰恰体现了他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。他独创性地将内容分为饮食、服饰、用具、称谓、岁时、名物、量词、典制等十九大类，构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俗学知识体系。这种“分别部居，令不杂厕”的严谨体例，使《证俗文》在清代同类著作中显得尤为突出。

三、器物考证中的文明解码

郝懿行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即善于从日常器物和生活细节入手，窥见背后宏大的制度结构与文化意义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研究方法，使得原本琐碎的名物考据具有了深广的社会史、文化史内涵。

在对古代服饰“褌”的考证中，郝懿行展现了他独特的研究视角。他不满足于仅仅解释这个字的字面意义，而是详细考证了“褌”的形制、材质、穿着顺序等具体问题，从中透视出古代服饰制度的演变轨迹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引用《史记》中司马相如“着褌鼻褌”的典故，推断出这种服饰在当时社会中多为劳动者穿着，从而揭示了服饰背后隐藏的社会阶层信息。

即便是对一个简单的“飧”（晚餐），郝懿行也能做出一篇大文章。他从《说文解字》考到《周礼》，从字形分析到读音演变，

最后结合山东东部的方言习惯，考证出“飧”本指“水和饭”的夕食，在民间生活中依然被使用。这样的考证，不仅解决了具体词语的释义问题，更在日常生活细节与古代礼制之间建立了有机关联。

关于寒食节的起源，民间普遍流传着介子推的传说。郝懿行经过缜密考证，指出这个说法在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早期文献中并无记载。他追溯到了更早的源头——《周礼》中记载的“仲春修火禁”制度。通过这种溯源工作，他揭示了寒食禁火习俗的本质：源于古人对星象的观察和顺应季节变化的生活智慧。至于介子推的传说，则是后世附会上去的。这种考证不仅厘清了历史真相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们看到：许多看似“俗”的民间习俗，往往有着深厚的“雅”文化渊源。雅与俗之间，并非截然对立，而是相互渗透、相互转化。

四、学术范式的双重革命

在郝懿行之前，清代学者对俗语的的关注已有所体现，但这些研究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。翟灏的《通俗编》虽然收集了大量俗语材料，但分类杂乱，更像是一部未经系统整理的材料汇编；钱大昕的《恒言录》考证精审，但其主要目的是辅助经学研究，俗语在其中仅充当工具角色；李实的《蜀语》保留了珍贵的方言材料，但地域限制严格，缺乏学术体系性。

《证俗文》的根本突破在于，它第一次为俗学建立了一个完整、系统的学术体系。郝懿行不再将俗文化视为经学的附庸，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。他证明了俗学可以成为一门具有自主性的学问，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、方法和价值体系。这种“俗学本体化”的

自觉意识，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。

郝懿行创造性地将考据方法应用于对民间文化的整体考察，实现了文字考证与实物考证、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、语言分析与文化阐释的有机结合。在考证“市井”一词时，他不仅追溯其文字源流，更从《春秋井田记》中钩稽出古代“因井为市”的社会组织形态，从功能与社会的关联角度揭示了这个词背后的历史内涵。这种研究方法，已经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边界，进入了社会史、经济史、民俗学的交叉领域。

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，对后世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现代民俗学、社会史、物质文化史等学科的研究方法，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在《证俗文》中找到思想渊源。

五、从文献到思想的层叠意义

《证俗文》自问世以来，其学术价值得到了历代学者的广泛认同。钟敬文在《民俗学概论》中评述道：“明清时期，文人学者做了许多归纳民俗语言的工作，连钱大昕、郝懿行这样的著名学者都参加进来，撰写了《恒言录》《证俗文》等著作。他们经过亲自调查，记录和保存了一批当时活在群众口头的民俗词汇，为后人研究前代语言民俗的传承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”这一评价准确揭示了《证俗文》在保存民间语言材料方面的独特价值。

刘叶秋在《中国字典史略》中从编纂体例、注释严谨性、引证广度等多个维度肯定了《证俗文》的学术价值。

姜聿华在《中国传统语言学要籍概论》中则从语言学专业角度肯定了它的地位，认为它是“清代方言俗语辞书中价值较高的一部”，其考释之严谨、编辑之条理，均超出清人此类著作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证俗文》

在方言研究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著名方言学家钱曾伯教授指出，该书保存的大量胶东方言材料，使其成为“胶辽官话研究的奠基之作”，为研究清代山东方言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语料。在汉语史研究，特别是方言史研究中，《证俗文》发挥着类似“语言化石”的重要作用。

从更广阔的视野看，《证俗文》的价值不仅在于具体的考证成果，更在于它所体现的学术思想的转型意义。在乾嘉考据学的框架内，郝懿行突破了传统“雅俗”二元对立思维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，这种突破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——它开始承认民间文化、日常生活经验本身的价值，不再将它们视为必须依附于“雅”才能获得意义的存在。

与此同时，《证俗文》体现了一种对“常识”的重新发现。书中考证的大量内容，无论是饮食起居、服饰用具，还是节令习俗、方言俚语，都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六、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

在当代学术语境中，《证俗文》的价值不仅没有衰减，反而日益凸显。对于语言学家来说，书中保存的大量清代方言资料，是研究汉语历史演变的宝贵材料。那些“今东齐人谓”“今俗呼”的鲜活记录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两百多年前百姓口中的真实语言。特别是在胶辽官话研究领域，《证俗文》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，为方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提供了珍贵材料。

对于民俗学者而言，《证俗文》提供了理解传统习俗的文化钥匙。许多今天依然流传的节日习俗、生活礼仪，都能在书中找到渊源和解释。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资料库，

也是民俗文化传承的桥梁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领域，《证俗文》展现出多方面的当代价值。那些对古代服饰、器物、饮食的详细考证，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提供了可靠依据；对传统工艺的记录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当我们站在21世纪回望《证俗文》这部著作，会发现它不仅是一部记录清代民间语言的工具书，更是一部承载着丰富文化信息的百科全书，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方法论，一份连接古今、沟通雅俗的文化遗产。